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

(专 辑)

论苏联东欧和 国际形势新格局

本社选编

时事出版社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专辑）

论苏联东欧和国际形势新格局

本社选编

（内部发行）

时事出版社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专辑）
论苏联东欧和国际形势新格局
本社选编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邮政编码：100081

昌平东沙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字数：194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

ISBN 7-80009-113-9/D·53 定价：3.80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随着苏联与西方关系日趋缓和，苏联国内改革开放深入，东欧国家政局动荡，两德统一进程加快，欧洲与整个世界的格局、东西方关系以及整个第三世界的形势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我们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西方和日本的重要刊物中选出18篇文章，编成了这本《论苏联东欧和国际形势新格局》专辑。

这些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内容：（1）西方对当前国际形势总的估价及对策；（2）东西方关系间出现的新的安全与防务问题；（3）两德统一问题及其对今后国际关系的影响；（4）对苏联、东欧的变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前途的评估。这些文章大体上反映了西方的观点、立场，它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整个20世纪，遇到了曲折和困难，二次大战末雅尔塔会议所形成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都在重新调整，这对西方国家领导人来说，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些文章中，有的为当权者提出了新的战略对策，有的就国际关系新变化表述了新的价值观和是非尺度，有的作了系统的历史追溯，有的进行了宏观的政治评估；作者中有不少是当年政坛上的决策人物，如吉斯卡尔·德斯坦、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和中曾根康弘等，有的是一些国际上有影响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的知名人士。

由于这些文章的论述都具有一定代表性，而且主要为供国内

有关领导和单位人员研究国际问题时参阅，除了个别文句，一般均未删节。

本书编选者和校译者均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和研究
人员，由万树玉同志主持编选，谨在此对全体积极参加本书编译工
作的同志表示谢意。

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时事出版社编辑部

1990年6月

目 录

新阶段的东西方关系

-[法]吉斯卡尔·德斯坦
[日]中曾根康弘
[美]亨利·基辛格 (1)

两个欧洲：东欧与西欧

-[法]吉斯卡尔·德斯坦 (21)

北约90年代面临的挑战

-[美]萨姆·纳恩 (29)

戈尔巴乔夫的战略和西方的安全：

幻想与现实的对立

-[美]威廉·E·奥多姆 (43)

中欧的安全问题

-[美]亨利·欧文
[美]爱德华·迈耶 (58)

竞争战略

-[美]戴维·M·阿布希尔
[美]迈克尔·穆迪 (77)

跟上形势，裁减军备

-[美]乔纳森·迪安 (93)

生活在事态必然发展的现实中

-[美]亨利·基辛格 (105)

苏联赞同两德统一以后	[美]丹尼尔·本杰明 (116)
进入美好的新世界	[美]弗里德·科勒曼等 (123)
“欧洲大厦”与苏联的欧洲政策	[英]尼尔·马尔科姆 (134)
共产主义之后的民族主义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158)
宁可混乱而不要镇压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184)
中央控制不了	[英]尼尔·马尔科姆 (187)
没有海图即起航的东欧经济	
——苦于生活水平下降及外债累累的	
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有无前途?	[日]熊野政晴
	[日]森哲郎 (192)
东欧的“地下熔岩”为何喷出?	
——东欧各国不久将成为欧共体	
的准加盟国	[日]佐藤经明 (205)
苏联力量的衰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美]马克·卡茨 (215)
远方的雷声	
	[英]托尼·詹金斯 (231)

新阶段的东西方关系

〔法〕吉斯卡尔·德斯坦

〔日〕中曾根康弘

〔美〕亨利·基辛格

东西方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已影响到东西方关系的气氛，在某些领域甚至影响到双方的实质性关系。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对未来的苏联内部制度、外交政策和东西方关系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可是，仅仅根据他的个人言行来分析这些事态发展和制定西方的政策，就会铸成错误。要使分析和政策经得起时间考验，就必须计及苏联的基本需要和西方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机会。

我们是根据这样一种执着的看法撰写本文的：我们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将决定未来几十年国际关系的前途。迄今，我们在对这一挑战的重要性上，对它反映苏联政策持久变化的程度上，甚至在我们民主国家对此应持什么态度等问题上，都还没有达成共识。

有些人认为，在苏联出现更大变化之前，西方工业化国家应该谨慎地袖手旁观，或者继续奉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遵循的老政策。另一些人认为，苏联的威胁已经完全改变，西方现有的防务安排和政治机制因而可改弦易辙。

本文作者吉斯卡尔·德斯坦曾于1974~1981年任法国总统；中曾根康弘曾于1982~1987年任日本首相；基辛格曾于1969~1974年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助理，于1973~1977年任美国务卿。

根据我们与共产主义国家交往积累的共同经验，与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现领导人的讨论，以及西方专家们研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这些国家不能提出一个明确的日程安排和战略，那么，我们想按照西方的路子改变东西方关系性质的机会就极其难逢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苏联的主动建议采取消极被动，甚至拖拉延宕和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态度，那就必会使克里姆林宫去确定东西方的议程，从而首先使苏联受益。

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同我们这些国家有重大利害关系，没有多少人会对此发生争议。40多年来，维护我们这些国家的安全，保护别国人民免遭苏联扩张之害，使我们背上了极为沉重的包袱，偶尔还严重影响了我们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不得不生活在时时会酿成灾难的冲突的威胁之中。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不仅保卫了国防，而且也阻止了东西方军事冲突的发生。

我们并不期望一夜之间就大量地卸下这些包袱。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希望消除苏联集团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在制度、观念和利益上的根本差异。我们的领导人也不应抱有这种期望。改变会慢慢地到来，而且其中各有得失。同时，我们这些国家仍需保持强大和警惕。无法保证东西方关系定会变得更加和好。牢固的东西方关系的新基础必须一砖一瓦艰苦地砌起来。

苏联的发展趋势

我们对苏联的估计基于两个前提：（一）苏联对内对外政策变化的压力反映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危机，而不单是苏联某一个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二）80年代末期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与过去几个缓和时期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出现的一位出类拔萃的领导人，他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届苏联领导人。就其个人风格和天赋看，他接受改

革要比其他领导人更快，更放得开。尽管这样，我们还是相信，促成改革并规定改革方向的，是苏联的客观需要。即使戈尔巴乔夫下台，改革的现实很可能仍会使苏联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和方向维持下去，当然也会有不同，但那只是速度放慢、作风上拘谨一些罢了。

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都不得不设法振兴经济并克服长期因袭的社会弊病。而且，美国为对付苏联扩充军备而在西欧部署中导、波兰的持续不断的危机、中苏的长期争论、日苏关系的冷淡以及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的失败，也都迫使苏联不得不重新估计其外交政策了。

我们这些国家制定对苏战略需要建立在对以下两个因素作出正确估计的基础上：推动苏联彻底进行国内改革的必要性和苏联与西方对抗的缓和。我们相信，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继续领导下，而不是由他的知名政治对手掌管，这些变化会发展得更快。

同时，苏联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可能出现十分不均衡的状况。可以设想，苏联可能采用中国的模式，在努力尽快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的同时，加强中央的政治权威。

苏联的新外交也有了空前的大发展。它不但涉及军事水平和规模的变化，也涉及政治和地区问题。除了军备控制问题外，苏联也力求在一些地区冲突问题上取得妥协，例如，引人注目的有阿富汗问题。这种将解决军事、政治和地区性问题融为一体的政策做法一旦实现，势必会产生新的安全概念。对此，西方国家至少得确定一致的政策和安全部署。

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并向我们重申，苏联如要实现国内改革计划，就需改善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对我们这些国家而言，苏联将国内改革列为工作重点事实上就比改革是否真能成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对国内改革的优先考虑与冷战时期苏联的一贯安排正好相反。

国内改革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还在于苏联国内存在十分明

显的信仰危机。过去苏联领导人很少怀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优越性，虽然苏联与西方国家在生活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但是他们深信共产主义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在国际交往迅速频仍的条件下，日常的相互比较促进了这一信念的破灭，这就使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路线变得不可避免。甚至在两年半前，这样的改革刚刚起步时，人们就抱着极大期望，认为戈尔巴乔夫设想的改革会在经济方面立刻见效。结果表明，实施改革计划的困难，改革的复杂性以及改革计划与具体结果的巨大差距等种种因素都被大大地低估了。

从今年1月看，苏联的形势十分暗淡。过去几年的乐观情绪消失了，我们感到，苏联人已持有一种新的更现实的认识，那就是，他们单是使现有经济取得发展就遇到了巨大困难，因而极不会想着开始与资本主义国家去缩短差距了。这种悲观情绪的滋长迫使戈尔巴乔夫加速体制改革，以促使苏联经济的复兴。驱使戈尔巴乔夫缓和国际紧张关系的正是这种困境，而并非是某种抽象的和平主义哲学。为了摆脱困境，他一个劲地降低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寻求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包括吸收外资在内的有利的经济关系。

国内改革

在我们看来，戈尔巴乔夫当政四年来，苏联的经济改革造成了很大混乱而未取得很多实质性的成果，甚至连相当小的改革也引起了反弹，例如，自由组织合作社的作法就遭到了保守派和相当大部分舆论的反对，认为这种作法会产生不平等关系和滋长特权。提出让个体农民长期租赁土地的主张也没有招引足够的人自愿接受，因为很多农民喜欢受雇于集体农庄，领取固定工资以求得到一个更熟悉更安稳而又不招惹是非的岗位；另一个原因，或者他们只是担心租赁土地政策会改变。至于更具本质性、更大刀阔

斧的价格制度和卢布兑换政策的改革就更不会尝试了。虽然戈尔巴乔夫去年已经战胜了保守派的一次反对，但很多改革措施仍受到行政部门各级官僚的抵制和反对，同时，最高领导层就苏联未来政策方向的斗争仍在继续着。

同时，苏联的民族矛盾尖锐了，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地，情况尤为明显。

因此，戈尔巴乔夫面临好几个左右为难的困境。经济改革要求权力下放，但在改革起步时，权力下放会造成新的混乱，并会削弱领导层对改革方向的控制。更紧要的是，权力下放正好会对建立在中央高度集权基础上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合法性提出挑战。公开性意在争取群众对改革的支持，但同时又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批评改革速度缓慢，并对改革计划中具体内容进行争论的机会。因此，改革既受到保守派的抨击，他们认为改革步子太快，又受到知识分子的批评，他们则嫌改革步子不够快速。

苏联最近的选举就显示了这种左右矛盾的情形。选举结果削弱了不少保守的反对派势力，有助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同时也表明，经济发展的速度缓慢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这不仅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将人民加速发展经济的要求变成了苏联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对改革的不满很可能会变成更激烈的经济改革的要求，而不是要求回到传统的共产主义模式中去。

最后，改革的成果只能在经过长时期以后为一般苏联公民所享有，而既得利益阶层则会因必要的调整而立即受到损害。如在中国，物价改革是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但在短期内，这样的改革在政治上却具有爆炸性。通货膨胀威胁的不断加剧会为延缓改革者添加口实。

这些进退两难的困境使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的实施变得艰难而又危险。但在同时，改革对苏联又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改革从根本上讲就是努力使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维持到21世纪，并且使其经济发展水平不至太落后于美国、日本和欧共体。显然，

走向成功的道路既漫长又艰难。绝对的条件是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制度，以便使苏联更接近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观念。这就是我们所支持的改革之含义。

外 交 政 策

苏联国内的改革产生了外交政策的“新思维”，这表现在两个重要而又有点对立的方面。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在与我们的谈话和公开演说中都明确地将苏联在外交关系上的“可预测”的需要同苏联将重点放在国内改革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他说：“与以往相比，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国内政策，取决于我们全力以赴旨在发展国家的建设性行动。因而，我们需要持久和平和可以预测而又具有建设性的新的国际关系。”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由于将国内政策付诸实施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且很可能失败，所以，日益倾向设法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以作为弥补。这种意图促使他试图削弱，乃至破坏美国与欧亚盟国的联系，总之是要迫使美国退回西半球去。西方民主国家必须抵制他的这种战略。

戈尔巴乔夫执行的这一政策的第一部分就是其外交政策中为适应形势而真正调整的方面。他的新做法已经对苏联历来奉行的和类似沙俄帝国时期外交政策中的一些基本信条提出了挑战。他曾表示，苏联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以大量扩充战略武器作为一种政治战略是否值得，已在苏联的内部辩论中受到了挑战。现在连苏联高级军官也对传统的依赖大批军队和大规模的常规武器取得优势的思想提出了质疑。这种态度的转变，从苏军撤出阿富汗和苏联对越南在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上已有目共睹。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承担了促使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的风险，确是空前的壮举。

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大宣布裁军50万的决定，目的很可能在于减少巨额财政赤字，尤其要使超编的苏联军队实现现代化。无论如何，作为相互和公正裁减常规部队迈出的第一步，应当受到欢迎。

苏联新外交政策的第二部分中却仍有一些重要方面对美国及其盟国提出了挑战。例如在与苏联诸领导人的交谈中了解到，苏联显然仍不愿意在东欧执行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宣布的不干涉原则，也不愿意在与东欧各国关系中实行如对中国那样的平等原则。苏联也已表明不愿承认日本对被苏占领的“北方四岛”的主权要求，并且继续在西半球支持敌视美国的政权。

苏联仍将是欧亚大陆的军事大国。只要它的相对军事优势仍然存在，武力威胁将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抵制苏联想把美国推回到西半球去的战略事关民主国家的共同利益。因为如果这一战略得逞，苏联就可能利用其地处欧亚中心的位置——地削弱和瓦解其邻国。苏联现行政策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对欧政策，就与这一长远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西方国家必须学会对付戈尔巴乔夫的行为风格。其特点是，迅速采取一系列单方面的行动用以冲击西方的决策过程，其中有些行动是真正的让步，有的主要是搞心理战。要使东西方关系获得真正的进展，西方在执行政策时必须辨明苏联哪些行动是真正的让步，哪些是宣传姿态，并应从实质和公共关系两方面作出反应。我们必须确定自己的主动行动和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反映我们这些国家对世界和平的理解和我们的人民对进步、民主的希望。

三边委员会的纲要

战略关系

美苏中程核武器条约的签署，维也纳常规武器和军事力量谈

判的举行，以及美苏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取得的进程，促使东西方新的战略对话正在形成。

期望大量削减某几类武器和兵力是这次新的对话的共同议题。戈尔巴乔夫已经采纳了这一些议题。在中程核武器会谈时他显然理智地接受了零点方案。他还提出了消除欧洲短程核武器的建议。在维也纳，苏联代表团提出分三个阶段将常规部队和主要武器系统裁减到远低于北约现有的装备水平。他还宣布单方面裁军50万，包括从东欧撤出坦克和坦克师，以及削减在东亚的军队。

我们也注意到，很多苏联发言人都拥护戈尔巴乔夫的说法，谈到要采取“防御性”的防务战略和以“合理的足够”原则作为确定其军事力量规模的标准。这表明苏联的军事理论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这一切都有待通过谈判与苏联军事力量的实际部署和军事行动来予以证实，而不是主观愿望所能做到的。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建议在西方舆论界引起了反响，从而对西方国家缩减防务开支产生了压力。这些建议引起了以下有关问题的争论：在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中应优先裁减哪几类？西方将核武器削减到什么程度才能既不削弱国防又能保持威慑力？在此背景下，还有军备控制在维护安全中的作用和军备控制与地缘政治的关系等老生常谈的问题。此外，西方还有一种不良倾向，即不是把防务与军备控制看成是互为条件的关系问题，而是视为二者必择其一的作法。

我们对战略形势的分析根据三个前提：

1. 苏联国内要求裁军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上的需要，即在军备竞赛的情况下，苏联不可能达到经济改革的目标。由于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都有相当能力在任何级别上与苏联保持大致相当的军事力量，这事实就更是这样了。

2. 苏联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它的一个战略意图：苏联领导人可能确信，苏联在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

优势，以及拥有随时可以动员的后备军事力量，能使它在任何裁军规划中都可处于固有的优越地位。

3. 西方国家只要心中明白，裁军本身并非最终目的，就应当对裁军成为东西方对话的中心议题持欢迎态度。使裁军有可能开始的条件是民主国家愿意保持足够的威慑力。愿意确保在任何一级裁军时都能维持并加强威慑力，才会使裁军的进程继续下去。这种“保持威慑力的裁军”概念必须符合两个严格的标准：（1）西方的威慑信誉和能力必须保持在不差于每一阶段裁军前的状况；（2）双方裁军的结果，不应是削弱而应是加强常规防务能力。

为了实行这两个标准，必须对军备控制过程中每一阶段之前或之中的新的军力对比进行仔细的估量。这样一个安全概念——在每一裁减阶段前使裁军、威慑和防务相一致——的含义还有待确定。这是我们这些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最紧迫的任务，必须使这个概念适应于90年代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后面要讨论的欧洲政治的演变必定是这种安全概念中的主要内容。

在确定新的安全概念时，必会涉及以下一些问题：

——战略武器协定的达成必须产生一种比没有条约时更为稳定的战略关系。在裁减任何战略武器的同时，都必须力求使那些国家生存所需的计划，如研制机动导弹或增加潜艇等，得到国会或议会的支持。

——西方现已广泛接受常规军备控制的建议。但目前常规武器占有的不平衡和地缘政治的基本状况对苏联都极有利。而且，根据中导条约撤除重要的核武器之后，常规武器的这种不平衡就变得尤为至关重要。西方国家有必要明确，北约的常规武器裁减到什么程度正好使其常规防务能力不比目前的要差。各国政府都有责任在裁军过程中将其防务能力保持在这一最低限度以上，苏联的建议至少有部分包括这样的意图，即将西方的军力降到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以下，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面临了一个

严峻的挑战。

——必须审慎地评估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和控制常规武器之间的关系。戈尔巴乔夫已提出裁减核武器的问题，他实际上正在力促实现无核化——至少是中欧的无核化，这一想法受到了某些西方舆论的欢迎。但是，我们认为，这与我们提倡的威慑是水火不容的。而且，有可能早在削减常规武器协定缔结之前就达成另一个裁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可是，我们的观点却是，战略武器条约最后阶段的实施应有待于常规武器控制协定的完成。

——常规武器的裁减将对东欧和西欧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它必涉及西欧的统一进程，目前在欧洲流行的关于“全欧大厦”的各种想法，以及美国将在“全欧大厦”中起何作用等问题。

——“保持威慑力的裁军”概念最终务必要为有关战略防务的争论提供解决办法。里根总统宣布战略防御计划以来，各种批评一直都集中在该计划的无懈可击的远大防务目标上。这种防务如要完全实现，得花几十年的时间。美国或北约盟国对这一计划的中期方案却缺乏认真的斟酌，例如，对保卫美国弹道导弹基地和盟国人民免遭小规模袭击等问题就缺乏研究。完全放弃防务，让民众随时面临各种核武器攻击的威胁，将是致命的错误决策。

总之，需要重新确定东西方之间的战略关系和安全关系。无论是地区性还是战略性的军备控制，都仍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必须将军备控制与更大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目标联系起来。必须以一种可能促进政治和解的态度着手抓军备控制问题。在这方面，欧洲的作用将变得特别重要。因此，我们主张采取一种平行的政策，在裁军的同时要确立这样一种思想，即在军备各级仍需保持强大的防务，在政治问题上增加取得进展的机会。

地区性冲突

到目前为止，各方还未认识到解决地区冲突和将其与东西方